

教育史资料书的典范

——试析孟宪承等对《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》的编纂

文 正 东

(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上海 200062)

摘 要: 为了帮助初学者学习中国教育史, 孟宪承等编纂了《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》。通过对编者的编纂思想和编纂实践的分析, 可以看出, 编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, 注重教育史学术人才的训练, 讲究选材、编排, 最终编纂出这本堪称典范的教育史资料书。

关键词: 孟宪承; 教育史资料书; 编纂思想; 编纂实践

文献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, 古人云: “水之积也不厚, 则其负大舟也无力; 风之积也不厚, 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” (《庄子·逍遥游》) 就表明了这意思。作为中国历史学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教育史, 也必须以厚实的史料为基础。但要学习、研究教育史不久的人, 在尚未具备古文字学、版本学、辨伪学、考据学、校勘学、目录学知识和技能的情况下, 去诸多旧籍中寻觅, 时间和经济都不允许。

因此, 需要有这么一类书, 在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后, 内容既包括该学科主要的、重要的文献资料, 又能提供相关线索, 以便作进一步探究的指引。

《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》就是这样一本资料书, 由孟宪承与陈学恂、张瑞璠、周子美编纂, 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初出版。截止到1985年, 已印刷5次, 印数累计达56200本, 是中国古代教育史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参考书。笔者曾在CNKI数据库(网络版)中, 在检索项“参考文献”中输入“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”, 年度为1979—2009, 反馈结果是: “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库28项,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库99项, 期刊全文数据库188项, 世纪期刊37项, 共352项。”另外还有一些引用该书而标注为引自原文的, 因为该书中的一些资料并非照录原文, 而是略有加工, 所以, 是引用的原文还是此书, 是可以看出来的, 这种引用的具体数量就难以得知了。

由此可见此书在中国教育史学科中的作用和地位。

教育史史料学的开辟者是舒新城, 他的《近代中国教育史料》, 中华书局1928年出版, 收入了从同治初年同文馆开办到民国十五年(1926年)的六十多年的教育史料。此书是在舒新城创造的史料观指导下编选的, 收集史料时注意了鉴别真伪, 然后将史料分作文字记录、实物记录和耆旧记录三类, 接着进行审定, 注意将有独特性、代表性、真实性和多侧面性的史料编入书中。^①正是凭借着系统的近代教育史料观和自己的努力, 舒新城编出了这本“存中国新教育之文献”的近代教育史料书,^②此后几十年未有超过它的。

然而, 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仍旧是个空白, 这个空白三十多年后才由孟宪承等编纂的《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》来填补。该书内容分两部分, 一是从殷周到清中叶的教育发展资

料,一是从孔子到戴震二十位思想家、教育家,以及几位文学家作品的相关教育资料。这样,两书珠联璧合,相得益彰,将古代和近代的中国教育史料较完整呈现在读者面前,为学习和研究中国教育史提供了很大方便。

应该说,较之近代教育史资料,古代教育史资料的编纂难度更大,对编者的要求更高。首先,古代语言文字就是一大难关,不具备训诂学等知识难以胜任;其次,古代的教育史料要多得多,并且和其他记载混杂在一起,这就使搜寻、鉴别、编排古代教育资料更难。孟宪承等人在编纂中的甘苦,现难以确知,陈学恂先生提供的一则材料,从侧面反映了编纂之难:每章编写出来后有工作总结,详细具体指明编写中存在的优缺点,再加以修改,仅仅第三章的修订就用了5个月。^③修订的缓慢,一可见其严谨作风,二可见编纂的艰辛。

2007年,华东师大为纪念孟先生,决定出版《孟宪承文集》,由瞿葆奎教授、杜成宪教授分别担任正副主编,笔者躬逢其时,忝列其中,编校《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》,在瞿葆奎、孙培青、杜成宪三先生的指点下,对孟先生编纂的该书有一些认识。下面从编纂思想和实践两方面作一些介绍。

一、编纂思想

(一) 重视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

编纂总是在某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,如果没有贯穿一定思想,那就只是一堆零乱的史实。孟宪承在解放前就钻研过马列主义,在浙江大学工作的时候,曾开设过“马列名著选”的课,讲辩证法、唯物论、认识论等。^④因此,他很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该书的编纂,在书的《编者说明》中明确指出:“资料的选辑,首先注意探索教育历史领域内两条路线——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路线与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路线——的斗争发展过程”;在第三章修订工作总结中,孟宪承指出该章存在的问题是:“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矛盾,尤其是经济基础内在的矛盾;本章对于经济基础,完全没有说明。至于上层建筑中,教育与政治的矛盾,虽有一些,也很不够。”^⑤这种唯物史观是贯彻于全书的,如第一章“殷周的教育”的第一节“绪论”,就选了生产力的发展、文字的创造、科学知识的萌芽、宗法制度的形成等背景材料。这样安排,有助于读者全面深入了解殷商教育发展及其与时代、社会的关系。再如第三章第八节“明代教育”,选了“资本主义的萌芽”的材料,意在让读者了解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状况,而明白了这些背景材料,就容易理解明中后期价值观念变化的原因,进一步明白产生王阳明心学、“思想异端”李贽的原因。书中虽然没有编者的议论,但其思想观点同样得到了表达。这样,普遍联系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哲学观点就不再抽象、空洞,而是有史实可证的了。既体现了编者的哲学造诣,也启示了读者,要把教育提升到哲学层面来思考才有深度。

因此,该书不只具有资料性,还融入了编者的思想、思考,这就不是一般的资料书可比的。

(二) 注重教育史学术人才的培养

孟宪承等编此书的目的,主要是为了教学上的需要,师范院校教育专业的师生以及教育科研工作者需要有这样的参考书。基于训练中国教育史专业学术人才的考虑和对教育史专业的认识,孟宪承一直重视原始资料的学习,在华东师大指导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的时候,围绕史料,讲了考证辨伪,强调:“我们要培养研究能力,就要掌握资料和方法。”^⑥所以他要求学员读原始资料,并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书面作业。后来在选编《中国古代教育文选》过

程中,谈及治学问题时,再次阐明学问的根底在经史,强调读原著是头等重要的事,他说:“宁可读通原著几篇,而不看评论十篇。……读过原著之后再去看评论就很容易。”又引夸美纽斯的话告诫学生,原始材料是“根”,如果没有自己的“根”,犹如“摘他树之花叶装在枯树上”,“初看远看似真,但过一两天就不成了,因为不能自己生长,要吸收别的花果,而自己却没有生长活力,结果还是不行。”^⑦认为只有多接触历史文献,读一手的文献资料,知晓中国文化的“源”,才能理解“流”,才能在学术界立稳脚跟,才具备学术发展的潜力。^⑧类似这样强调读原著的话,在《孟宪承讲录》和《孟宪承谈话录》中还有不少。他不但这样说,也这么做,该书那么多材料,大部分是第一手的原始性资料。

孟宪承这种重原始材料的治学风格,被华东师大中国教育史专业的学人代代传承。

同样,为了让学术人才具备宽厚的知识基础和宽阔的学术视野,孟宪承没有采纳只选原始性材料的建议,坚持编入了一些考释性资料。如为了让读者明白“辟雍与明堂”,在摘引《礼记》有关原始材料的基础上,编者又征引了惠栋、金鹗、阮元、王国维、刘师培、吕思勉等对“辟雍”、“明堂”的考证。这样,读者对古代大学的建制就有较全面的了解。如果还需作进一步探究,就可以根据该书提供的线索,或找所引资料的原著来研读,或寻毛奇龄的《学校问》、蔡邕的《明堂章句》等来加深理解。毫无疑问,这对培养学习者的学术研究能力是有帮助的。

此外,编此书也和中国教育史料的特殊性有关。因为相对于中国史来说,中国教育史是专门史,然而教育并未成为专门的记述对象,而是和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宗教的记载交混在一起的,形成了中国教育史资料既分散而又真伪夹杂的特点,这是学习中国古代教育史的一大难点,尤其是对初学者。

于是,为了帮助学习者跨过资料难关,也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方便,四位先生不辞辛劳,从汗牛充栋的经、史、子、集、金石铭文、地方志、私家札记中爬罗剔抉,披沙拣金,编纂中反复斟酌,多次修订,最终编出了这本嘉惠后学的资料书。教育史学界对它的评价是:“此书既有史料价值也有学术价值”,“是中国教育史和教育学的教学和科研有用的工具书。”^⑨这是准当的。

借助此书,几十年来,不少人跨进了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的大门。

二、编纂实践

编纂实践是对编纂思想的落实,兹从资料的选、节、编三个方面作介绍:

(一) 选材

中国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,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和范围,主要包括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两方面。材料的选择,实际上关涉到对中国教育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认识理解,如果过度扩大中国教育史的外延,导致与文化史、思想史交汇太多,就有可能被它们吞并,那教育史学科自身的价值就丧失了。但如果仅仅将眼光局限在狭窄的教育领域,就教育看教育,对影响教育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材料不予涉及,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,也不利于教育史学术人才的培养。

该书在选材上的特点可以用“专、博、慎”三个字概括,说明如下:

1. 专

孟宪承认为中国教育史是专门史,并以此为基准从两方面选材:一是教育的发展,一是教育思想。特别是在“教育发展”部分,编者从零散的资料中搜寻到一些教育制度资料,

并编入书中。这种不忽视教育制度的编法,在当时,是很有个性的表现。因为建国后,我国学习苏联,在教育史学科中,存在偏重人物教育思想,忽略教育制度的问题。而此书就不存在这样的偏颇,讲汉代就有“汉代统治阶级的取士制度”,讲宋代就有“学校制度的因革”,这在那时可以说有补偏救弊的意义。

浩瀚的教育思想中,又当如何取舍呢?孟宪承设想这样来解决:在专门史的前提下,以独创性和进步性两条标准,只选取在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想家来作介绍,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、墨子、孟子、荀子,封建社会时期的董仲舒、王充、韩愈、朱熹、王守仁、颜元。应该说,在篇幅容量有限和教育思想丰富的矛盾下,孟宪承构想出这两条选择标准,是一种创见。可惜,书稿交到出版社后,受《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》一文的影响,增加了一些并非孟宪承本意的内容,^⑩对此,笔者另有专文说明。

2. 博

此书的选材还体现了“博”。孟宪承曾以研究孟子教育思想为例,说明孟子的思想言论并不只包括在《孟子》一书中,因此,要在《孟子》之外找有关孟子的资料。他说:“我们现在所引的材料,是力求抓住主要部分,抓住每个教育家谈孟子教育思想所必须包括的材料,但不能说孟子的教育思想仅限于此。”^⑪又以研究董仲舒为例说:“不能单读人家的论文,或看董仲舒本人的著作及传,还要从《汉书》中其他部分找有关材料。”^⑫这就需把研究建立在广博的资料基础上,如果只在教育领域内选材,不仅有可能遗漏重要史料,还主观地切断了政治、经济、思想等和教育的内在联系,不利于培养学习者思考的广度和深度。

正是在“博观”的指导下,全书征引的文献,既有先贤硕儒的名篇,如经史子集等,又有时贤俊彦的力作,还有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期刊杂志;既有官修史书,又有私家笔记;既辑录传世的材料,又摘引殷周考古中发现的甲骨文、金文,可谓“博”也。这“博”有如下具体表现:

首先,注意收集学术前沿的资料。也许从书名上理解,会以为书中只会有那些“子曰诗云”的古文,然而,翻书一看,采自古书的资料固然有,那时刚出版的不少新书也被纳入了编者的视野,如郭沫若的《奴隶时代》、《青铜时代》,李亚农的《殷代社会生活》,侯外庐的《中国思想通史》,杨树达的《积微居金文说》等,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才出版的,代表了当时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。

其次,注意拓宽教育史料的范围。编者不仅用心搜寻“纸面材料”,还将目光投向“地下材料”,将“二重证据法”应用于教育史,这在当时,还是不多见的。甲骨文虽然较早就被发现和研究,但被史学界采信则比较迟,作为教育史料则更迟。以前的教育史,要么避开夏商周那段历史,如陈东原的《中国教育史》(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)就从汉开始,要么以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尚书》等作证据,甚至用传说来说明。这样的研究,由于史料不足,可信度就不高。王凤喈的《中国教育史》(国立编译馆1945年版),虽然提到李济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发现,但没有用来证明那时期的教育,连“甲骨文”的字样也没有用,更多的还是用传统的纸面材料,可能对甲骨文还不尽相信。从笔者所见的资料来看,沈灌群的《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》(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)既是新中国的第一部中国教育史,也是明确直接应用甲骨文材料来证明商周教育的第一部教育史著作。而孟宪承则第一个把甲骨文编入教育史资料书,在殷周的教育中,用了“甲骨文、金文中的学校”这一条目,采摘了商承祚的《殷墟文字类编》、郭沫若的《殷契粹编》、杨树达的《积微居金文说》等材料。

3. 慎

资料不但要“博观”，也要“慎取”。孟宪承认为，在面临有许多材料可供选择时，就要分清主次：“只是把那些认为是主要的、必不可少的才拿到资料选录中，越少越好。”这就是“慎”，突出体现在：在殷周到清中叶的两千多年里，从浩如烟海的教育史料中，编者用三十二万多字就涵盖了，取材真可谓“慎”也，具体表现为：

其一是慎择材料。该书在史料选择上是有考虑的，以孔子的教育思想为例，编者选择了《史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礼记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中有关孔子的材料，其中，取自《论语》的最多，但回避了《孔子家语》、《孔丛子》等伪书，^⑨甚至《庄子》中以寓言形式讲述孔子的材料也未选，尽管这些书中讲孔子的很多。取与舍中，可以看出编者对原始的第一手材料的重视和治学态度的严谨，毕竟，就认识孔子及其思想而言，《论语》无疑是最可靠的。

其二是慎选版本。通观全书所引书的版本，最多的是商务印书馆的《四部丛刊》本、《万有文库》本、《丛书集成》本和中华书局的《四部备要》本，但没有从流传很广的《诸子集成》中选材，因为该版本是世界书局为了和别的出版社抢生意而出版的，舛误比较多。也有些古籍引自“古香斋”本、“汲古阁”本和“知不足斋”本，^⑩这些版本校对精审，比较可靠。版本其实是书籍质量的标志，如果版本不好，小则闹笑话，大则误事误人。

(二) 节略

一般而言，编者要对资料适当剪裁，否则内容枝蔓、篇幅庞杂，查找不便，失去参考和提供线索的意义。

孟宪承主张，“为了让学生读最精要的”，有必要对原文“改编删节”，“以控制篇幅”。这样，对资料提炼后，“由博而约，利于概括把握”。^⑪在此观点指导下，该书“所有的资料几乎都是摘录”；^⑫并且，为了不影响阅读，“摘录时多数未加删节号”，所以，此书“只是提供研究线索”，读者最好去“阅读原著”。^⑬

领人佩服的是，由于编者对所摘录的原文很熟悉，文字修养功夫又高，删节后并不失原意，文脉依然流畅连贯，不对照原文，几乎看不出节录痕迹。以张荫麟的《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》为例，原文总字数近两万字，经编者缩写后（略去了大量考证性内容），只有两千字左右，但主要意思仍然保存。如果不删节，那本书的篇幅远不是区区四百余页所能容纳的。

(三) 编次

资料书虽与专著不同，不能过分要求结构的完整和严密，但资料的分类和排列也应体现科学性，编者头脑中的体系结构如何通过读者的阅读而被理解，书的结构安排起着中介作用。下面从书的体例结构出发，作一些分析。笔者认为，该书编次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：

一是以“年代为纲，专题为目”的体例。全书以纵向时间为序，从“线”上将中国古代教育分为两编——奴隶制社会中的教育和封建社会的教育，每编又包括两章，第一编将奴隶制社会的教育纵向分为殷周和春秋战国两个时期，第二编将封建社会的教育按内容横向划分为教育的发展过程（侧重制度）和教育思想家（侧重思想）。

具体编排上，讲究逻辑层次。如在史料的分类和次序安排上，既依据现代教育学理论范畴及体系，又遵循古代教育史实的固有类别和教育思想的固有范畴，如殷周教育中学术官守、辟雍与明堂等，均标目以为材料归属。孔子这一专题，先传记，后思想，符合人的认识

逻辑；思想中又以政治、道德、宗教、教育为序，教育思想的材料则按教育对象与作用、教育目的、内容、方法等范畴分列条目，条目下的分类兼顾孔子思想固有范畴，如教育目的下君子、士、成人。

这样，全书既有概括性叙述——“面”的材料，又有典型例证——“点”的材料。如此点线面结合，将我国古代教育的主要材料汇聚起来。

二是以“教育发展、教育思想”为线索的双主线架构。两编四章中，第一章和第三章，以教育发展为线索来组织史料；第二章和第四章是教育思想，以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教育思想家为标目，大致按年代先后次序排列。

正是遵循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编排，使得该书虽然只是一本资料书，但也将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脉络和概貌清楚展现了出来，并为后人编纂教育史资料书提供了诸多借鉴和启示。

一言蔽之，融思想性、资料性、科学性于一体的《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》，堪称教育史资料书的典范。

注 释：

①舒新城：《近代中国教育史问题》，载《中华教育界》1928年第17卷第2期。

②舒新城：《近代中国教育史料》，中华书局1928年版，“凡例”。

③⑤孟宪承：《〈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〉第三章修订工作总结》（1958年4月4日），载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》（教育科学版）1987年第4期。

④董远骅：《教育学大师孟宪承的教学和治学作风》，见俞立中主编：《师范之师——怀念孟宪承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8-10页。

⑥⑪⑫孙培青整理：《孟宪承讲录（一）——中国古代教育史专题》（未刊稿），1957年2月2日笔记。

⑦⑬孙培青整理：《〈文选〉工作初步总结的三点认识应贯彻于工作》（1961年11月14日），见《孟宪承谈话录——关于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与教育史问题》（1961年3月-1963年4月）（未刊稿）。夸美纽斯的这个比喻见于《大教授学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，第176页。

⑧杜公卓：《丽娃河畔逸事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281页。

⑨杜成宪、崔运武、王伦信：《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91页。

⑩即将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》，将别人添加的“屈原、司马迁、范缜”，以及“几位民主文学家的作品对教育的影响”等四节删去，以符孟宪承先生本意。

⑬《孔子家语》，详细记录孔子与其弟子门生的问对诘答和言谈行事；《孔丛子》，记录孔子及子孙的嘉言懿行。原来一般认为是伪书，可信度不高。近来考古发现证明，它们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。参见李学勤：《竹简〈家语〉与汉魏孔氏家学》，载《孔子研究》1987年第2期。

⑭古香斋为乾隆皇帝书斋之一，该版本编校精工；汲古阁是明末清初的藏书家、出版家毛晋的藏书楼，毛晋所出书多以宋元善本为底本刊刻；知不足斋是清代藏书家鲍廷博的藏书楼，刊刻的书统称《知不足斋丛书》，以校勘精审著称。

⑮⑯孟宪承等：《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》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，“编者说明”、“出版者的话”。